

# 新时期中国党和政府关于抵御宗教渗透的理论和经验

何虎生 李晓雨

**内容提要**：在长期抵御宗教渗透的实践中，中国党和政府形成了一整套抵御宗教渗透问题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认为宗教渗透和危害涵盖思想、组织、政治三个层面，且相互交叉重合；宗教渗透具有国际、国内和宗教自身三个原因；要从思想认识、交往原则、政策法规三个方面来做好抵御宗教渗透的工作。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中国政府 抵御宗教渗透 理论 经验

**作者简介**：何虎生，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晓雨，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新时期，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渗透，进而达到分化、西化中国的目的，呈现出愈演愈烈的倾向，已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宗教事务的正常进行。党和政府把抵御宗教渗透作为宗教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

## 一、宗教渗透主要表现在思想影响、组织控制和政治颠覆等三个方面，并造成了严重危害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境外势力看到单纯的政治渗透难以达到目的，进一步加紧了对我国宗教渗透的步伐。宗教渗透特指境外团体、组织和个人利用宗教从事各种违反我国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活动及宣传，主要集中于思想、组织、政治三个方面。

首先是进行传教，扩大宗教影响，发展宗教信徒，以达到在思想上影响，甚至控制信教人群的目的。宗教信仰在思想和意识形态层面上完全不同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和无神论信仰。因此，宗教渗透首先是进行有神论宣传和活动。“宗教渗透是将一个社会中作为意识形态的宗教弥散扩充到具有异质文化的另一个社会中并将其社会化的过程，并力求使该社会的宗教文化控制并占领异质社会的思想阵地，消融异质社会的意识形态，达到同化和控制异质社会的最终目的。”<sup>[1]</sup>对于境外敌对势力而言，要对中国这样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意识形态和无神论者占人口多数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宗教渗透，首先要做的就是扩大有神论宗教在中国公民中的影响，增加信教人群数量。刘延东曾指出，传教本身不是渗透，但渗透却主要表现为传教。境外敌对势力“支持境外一些基督团体加大对我国搞‘福音化’的力度”。<sup>[2]</sup>在中国从事非法传教活动，发展信徒，从而在思想上控制皈依基督的信教人群。境外敌对势力在对我国中东部地区进行宗教渗透的同时，还“推行所谓‘福音西进计划’，向我国西部地区 and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传教，同我争夺信教群众”，<sup>[3]</sup>企图达到“中国龙被基督羊驯服”的目的。一些韩国基督教组织甚至提出先把中国的 220 万朝鲜族同胞“福音化”，再把其他中国人“福音化”。企图通过在中国大肆传播基督教以控制信众，达到思想渗透的目的。通过宗教渗透，境外敌对势力将宗教这一根本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有神论信仰输入中国，进而造成人们思想认识上的混乱，冲击

[1] 孙浩然：《关于宗教渗透的理论思考》，《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1 期。

[2] 江泽民：《论宗教问题》，《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390 页。

[3] 艾耐吐拉·哈力克、艾克拜尔·吾斯曼：《抵御宗教渗透是稳定发展的关键》，《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 年第 3 期。

主流信仰体系，动摇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进而达到从思想上“西化”、“分化”中国的目的。

其次是非法建立、发展宗教组织和活动据点，影响甚至控制我国宗教团体，干预我国宗教事务，进而达到组织渗透的目的。其主要手法有：一是发展地下势力，建立地下宗教组织，培植代理人，试图与我国的爱国宗教组织分庭抗礼，影响爱国宗教组织作用的发挥。在境外敌对势力的支持下，基督教的私设聚会点大肆扩张其势力，组织非法活动，抗拒政府部门的依法管理，有些甚至已经出现取代体制内教会地位的发展势头。二是攻击我国独立自主自办方针，以种种手段对爱国宗教领袖施加压力，插手我国宗教组织正常的教职人员调整，干预我国内部宗教事务。梵蒂冈一面宣称改善对华关系，一面“加紧干扰我主教选圣工作，与我争夺主教任命权”，支持和指使“天主教地下势力顽固与爱国会抗衡”，实质上是企图通过干预我国天主教教职人员的正常调整，来插手我国内部事务，破坏中国宗教的独立自主自办。三是以种种手段对我国爱国宗教组织进行组织渗透，干扰基层宗教组织的正常宗教活动，造成信教群众的思想混乱，妨碍公民的信仰自由。罗马教廷秘密委任地下主教，由这些地下主教晋升神甫并操纵一些骨干分子，建立全国性的组织，反对天主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针，争夺信教群众，天主教的地下教会势力被境外敌对势力所利用，其骨干分子“藐视国家法令，不服从政府管理，成立非法组织，从事非法活动，利用宗教欺骗和裹胁不明真相的信教群众，制造事端，破坏当地社会稳定”。<sup>[1]</sup>

第三是打着宗教的旗号，进行反动政治活动和宣传，其直接目的就是政治渗透。对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我进行政治渗透的目的，党和国家一直十分警惕。江泽民曾指出：“国内外敌对势力一直把利用宗教进行政治渗透作为他们对我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一个重要手段”，认为“这（指宗教渗透——引者著）实质上是政治问题”。<sup>[2]</sup>贾庆林也曾指出，西方敌对势力更加重视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渗透，与我争夺群众、争夺思想阵地，企图控制我国宗教，动摇我们党执政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培植反对我们党和政府的力量，也就是说宗教渗透的实质是政治渗透，也是其根本目的。宗教渗透是为政治服务的，政治侵略性是宗教渗透最为本质的特征。

上述宗教渗透的三个层面既相区别，又相交叉重合。思想渗透和组织渗透是实现政治渗透的途径，政治渗透则是思想渗透和组织渗透的根本目的。境外敌对势力通过非法传教来扩大宗教影响，发展信徒，进行思想渗透，以从思想上影响我国信教群众；通过在我国境内建立非法宗教组织和活动据点，进行组织渗透，企图控制我国宗教团体，干预我国宗教内部事务；打着宗教的旗号从事反动活动和宣传，进行政治渗透，企图“西化”、“分化”中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以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实现其政治渗透的根本目的。

党和国家从思想、组织、政治三个层面对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我进行渗透的内涵和危害进行了剖析，明确了宗教渗透的实质和目的，区分了宗教渗透与正常的宗教传播和交流之间的界限，为我们正确认识境外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宗教渗透的实质和如何抵御宗教渗透提供了认识前提。

## 二、造成宗教渗透的原因主要有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和宗教自身特点等，且相互交叉，具有特殊的复杂性

在抵御宗教渗透的实践中，党和政府逐步对宗教渗透产生的原因及其危害形成了系统的认识，认为既有国际和国内的原因，也有宗教自身的原因，且相互交叉，具有特殊的复杂性。

[1] 王作安：《中国的宗教问题和宗教政策》，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第233页。

[2] 江泽民：《保持党的宗教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1991年1月30日），《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211页。

首先,国际方面,既有西方国家利用宗教干涉社会主义和其他不喜欢的国家的一面,又有全球化进程加快,导致宗教活动多样化和复杂化的因素。利用宗教对社会主义和其他不喜欢的国家进行干涉,是西方国家的一贯手段。“长期以来,国际敌对势力一直把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作为遏制或颠覆社会主义国家和他们所不喜欢的国家的重要手段。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过程中,国际敌对势力就利用了宗教。”<sup>[1]</sup>西方国家实行的“和平演变”战略对于东欧剧变和前苏联解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宗教曾被他们用作渗透、颠覆前苏联、波兰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和有效手段。伴随着东欧剧变、前苏联解体,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冷战格局宣告结束,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之间的尖锐对立消失。西方敌对势力开始专注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极力夸大中国与西方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上的对立,将中国视为其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主要障碍。除对我国进行政治渗透和其他方面的渗透外,又故伎重演,利用宗教对我进行渗透,以达到在思想精神层面瓦解中国的目的。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宗教的传播、交流等活动更加多样、便捷,并日趋复杂,为宗教渗透提供了便利。数字技术、网络技术迅猛发展,深深影响了当代宗教的传播方式,为其提供了新的载体,由过去的主要由纸质传播变成了数字传播,尤其是互联网的传播,带来了学习方式、崇拜方式等的巨大变化,使得宗教的传播更便捷,受众更广泛。全球化推动了跨国界宗教活动的不断发展,为宗教的扩散和传播提供了机会,这也在客观上为境外敌对势力进行宗教渗透提供了便利条件。

其次,国内方面,社会变革带来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对外开放引起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为境外敌对势力的宗教渗透客观上提供了可乘之机。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为宗教的传播提供了便利。改革开放前,中国意识形态处于高度的一元化控制下,除唯物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外,其他的意识形态很难存在。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更好地发展本国经济、提高综合国力,中国坚持并不断推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改革开放。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深入进行,导致中国的社会状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领域中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等日益多样化,政治领域中选举制度、司法制度、政党制度等朝着更加民主化的方向迈进,文化领域中思想观念、价值选择、意识形态等日益多元化,这些变化清晰地展现了一个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的社会状况,为各种文化观念的冲撞和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也为作为文化之一的宗教的传播创造了便利条件,信仰也日益多元,信教人群也在不断扩大,客观上培植了宗教渗透的土壤。国内环境的变化也使宗教渗透多样化。境外敌对势力不仅借助正常的宗教渠道进行渗透,还向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福利等非宗教领域寻找突破口,“以旅游观光、投资办厂、经贸合作、文化交流等手段为掩护”。<sup>[2]</sup>如以举办中外学术文化交流活动的名义进行宣教,中国学生到国外留学,接受西方的宗教,外国学生到中国学习,带来本国的宗教等,这与中国处于转型期的国内环境是分不开的。由于转型涉及到社会的各方面,因此,宗教渗透的方式也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且相互交叉,互为表里,有时很难分辨清楚,具有特殊的复杂性。

第三,宗教自身方面,本身就有文化传播交流的功能,同一种宗教又具有认同性,使宗教易被作为文化扩张和政治渗透的工具。宗教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载体,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和意义,也承载着不同文化之间交流和融合的使命。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宗教所具有的文化载体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一种强有力的社会整合功能,即通过一系列的内在机制,从精神和意识层面将信徒们组织成一个社会实体。这种依靠精神和意识组成的社会实体往往具有巨大的能量,一旦被别有用心势力操纵和利用,其所产生的破坏力将是无法估量的,而这是其他渗透方式所不具备的。同时,宗教作为一种社会

[1] 江泽民:《论宗教问题》,《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78页。

[2] 江泽民:《论宗教问题》,《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90页。



意识形态，本身就具有强大的现实渗透力。对内，它可以渗透到一个民族共同体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内化成为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它往往表现出极为强烈的传播愿望，通过广播教义来发展信徒，以扩大其自身的影响力，而且，其渗透总是披着劝人行善的外衣，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宗教的特殊功能，为境外敌对势力利用，成为其对我进行渗透，实现“西化”、“分化”中国的重要手段。同一种宗教具有强烈的认同性，也使一些信徒容易丧失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如天主教在当代中国的影响，“一些教职人员对境外势力渗透活动的认识不清醒，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立场发生动摇，有的甚至在事关国家主权和中国教会尊严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态度暧昧。”由于天主教实行圣统制，部分天主教信徒，甚至教职人员，在独立自主自办和承认圣统制的问题上模棱两可，也造成了“教职人员队伍的培养跟不上教会事业的发展，还有40多个教区空缺主教，自选自圣主教的任务仍然紧迫而艰巨。爱国组织建设仍显薄弱，骨干力量青黄不接，在信徒中的影响力和凝聚力有待进一步增强。”<sup>[1]</sup>体制内的天主教尚且如此，地下教会更是猖獗，他们甚至只承认梵蒂冈教皇，对中国独立自主自办的教会采取抵制态度。

基督教、天主教的背后是强势的西方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背景。“源自西方社会传统的经济体系、法律规则、国家制度、政治理念、哲学思想等正被作为一种‘强势’文化因素而以‘强制性’的方式在世界各地推行。”<sup>[2]</sup>在当代社会，西方国家仍然处于强势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宗教渗透已不是简单的宗教问题，而是外化为一种政治、经济、文化的强势状态，“一些西方国家以‘宗教自由’为名，在多边领域挑起对抗，在双边关系中干涉别国内政。”<sup>[3]</sup>所以说宗教渗透的原因已不再仅限于宗教领域，而且可能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

### 三、宗教渗透事关中国国家和宗教的安全，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依法抵御宗教渗透

2007年9月，贾庆林指出，要在新形势下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其中一条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坚决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抵御宗教渗透成为新时期党和国家宗教工作的重要内容，在实践中，党和国家逐步积累了一整套抵御宗教渗透的经验。

首先，在思想认识上，要高度重视抵御宗教渗透的问题，加强党对抵御宗教渗透工作的领导。主要表现在：（一）一贯重视抵御宗教渗透问题。早在改革开放初年，在1982年的中央19号文件中，中国党和政府，就意识到西方国家必然会利用宗教对我进行渗透，以达到其政治目的。1990年4月，陈云曾指出，“利用宗教，同我们争夺群众尤其是青年，历来是国内外阶级敌人的一个惯用伎俩，也是某些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丢失政权的一个惨痛教训”。<sup>[4]</sup>江泽民也强调指出：“对于敌对势力在我国搞宗教渗透和进行民族分裂活动，要保持高度警惕。”<sup>[5]</sup>2007年12月，胡锦涛指出，“对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渗透的危害要高度警惕和严密防范。”明确了抵御宗教渗透，关系到我国宗教工作的正常开展，关系到加强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二）明确表示在抵御宗教渗透问题上绝不让步。“绝不允许任何境外宗教势力重新控制我国的宗教，绝不允许任何境外宗教团体和个人干预我国宗教事务，绝不允许任何境外宗教组织用任何方

[1] 王作安：《谱写中国天主教事业的新篇章》，《中国宗教》，2010年第12期。

[2] 卓新平：《全球化与当代宗教》，《世界宗教研究》，2002年第3期。

[3] 王作安：《增强做好宗教工作的能力》，《中国宗教》，2010年第2期。

[4] 陈云：《关于高度重视宗教渗透问题的信》（1990年4月4日），《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177页。

[5] 《江泽民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78页。

式在我国传教。”<sup>[1]</sup>“必须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根本原则。这是我国信教群众的自主选择，是我国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支配控制的重要保障。越是扩大开放，越要坚持三自方针不动摇，始终贯穿于宗教事务和活动的有序开展中，体现于坚决抵御境外利用宗教渗透的自觉行动中。”<sup>[2]</sup>这是党和政府的明确态度，对各级党委、政府部门认识抵御宗教渗透工作的紧迫性、复杂性和重要性，提高对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干涉我国内政问题的警惕性，具有重要作用。（三）重视加强对抵御宗教渗透工作的领导。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一贯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要把抵御宗教渗透工作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当作重要工作来常抓不懈；在协作配合的基础上建立起抵御宗教渗透的工作机制，及时正确地给以指导和监督；基层党政组织要加强对宗教事务的依法有效管理，提高基层干部处理宗教渗透问题的能力，把抵御宗教渗透工作落实到位。

其次，在对外交往中，一方面要不断扩大宗教方面对外友好往来，另一方面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是为了在平等的基础上更好地开展宗教方面的对外交往，而不是把自己封闭起来。“要在平等基础上开展对外友好交往，介绍我国天主教发展状况，阐明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增进了解和理解，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交流合作。”<sup>[3]</sup>开展宗教方面的友好交往，既有利于消除其他国家民众对我国宗教方针和宗教政策的误解，塑造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又为其他方面的对外交流提供便利，构成了我国民间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宗教方面对外交往的正常开展，正是抵御境外敌对势力宗教渗透的重要方面。

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绝不允许外国势力干预和支配我国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警惕和防止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渗透，以保证我国宗教活动的正常开展。“要教育引导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坚持爱国与爱教相统一，增强国家意识、法律意识和公民意识，自觉在法律法规和政策范围内开展宗教活动，维护国家利益，遵守社会公德。要妥善处理基督教领域中的突出问题，切实解决无序发展、私设聚会点、自封传道人等问题，坚决抵御境外利用基督教进行渗透。”<sup>[4]</sup>只有在扩大宗教方面对外友好交往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根据中国宗教自身的特点和规章来处理宗教事务，才能防止境外敌对势力以宗教交流的名义对我国进行宗教渗透，干预和支配我国的宗教事务，才能构建抵御宗教渗透的内在动力机制。

同时，还需切实增强爱国宗教团体抵御宗教渗透的能力和自觉性。爱国宗教团体是我国宗教对外交往和抵御渗透的重要力量，“我国各爱国团体应当教育自己的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经常保持警惕，自觉抵制这种渗透。要看到，这种渗透的结果，首先和直接受害的是爱国宗教团体本身。”<sup>[5]</sup>我国宗教活动和宗教事务的开展有着自身的特点和规章可循，爱国宗教团体和组织必须据此来加强自身在思想、组织和制度等方面的建设，不受外国势力的干预和支配，充分发挥其在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中的作用。在加强爱国宗教团体和组织建设的同时，对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要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教育，以“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责任感，从思想上筑起抵制境外宗教渗透的防线，坚定走独立办教道路的信心和决心”。<sup>[6]</sup>

最后，在制度层面上，要切实完善宗教方面的政策法规，依法抵御境外敌对势力的宗教渗透。抵御宗教渗透，必须依法进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的基本方略，在宗教问题上，

[1] 王作安：《中国的宗教问题和宗教政策》，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第245页。

[2] 杜青林：《中国基督教历史的新篇章》，《中国宗教》，2010年第10期。

[3] 王作安：《谱写中国天主教事业的新篇章》，《中国宗教》，2010年第12期。

[4] 杜青林：《中国基督教历史的新篇章》，《中国宗教》，2010年第10期。

[5] 江泽民：《保持党的宗教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1991年1月30日），《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211-212页。

[6] 王作安：《中国的宗教问题和宗教政策》，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第246页。

“政府依法保护宗教团体和寺观教堂的合法权益，保护宗教教职人员履行正常的教务活动，保护信教群众正常的宗教活动，防止和制止不法分子利用宗教和宗教活动制造混乱、违法犯罪，抵制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sup>[1]</sup>针对境外敌对势力的宗教渗透，政府必须认真贯彻执行有关宗教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依法抵御宗教渗透，才能有效地打击境外敌对势力借助宗教进行的渗透活动，才能达到实际效果，才能做到长治久安。

逐步建立完善的宗教法律法规体系，做到抵御渗透，有法可依。为了规范境内外国人的宗教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规定：“禁止携带有危害中国社会公共利益内容的宗教印刷品和宗教音像制品入境”；“外国人在中国境内进行宗教活动，应当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不得在中国境内成立宗教组织、设立宗教办事机构、设立宗教活动场所或者开办宗教院校，不得在中国公民中发展教徒、委任宗教教职人员和进行其他传教活动。”<sup>[2]</sup>为了加强对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第四条规定：“在宗教活动场所进行宗教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活动场所进行破坏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安定、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和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活动场所不受境外组织和个人的支配。”<sup>[3]</sup>《宗教事务条例》针对外国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的问题，规定：“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员在友好、平等的基础上开展对外交往；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在对外经济、文化等合作、交流活动中不得接受附加的宗教条件。”“全国性宗教团体可以根据本宗教的需要按照规定选派和接收宗教留学人员。”“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可以按照规定接受境内外组织和个人的捐赠。”<sup>[4]</sup>上述这些规定为规范境内外国人的宗教活动和管理宗教活动场所提供了依据，从法律上界定了宗教渗透的概念范围。在开展抵御宗教渗透工作时，一方面要继续认真贯彻执行这些规定，另一方面还要抓紧出台配套的规章，进一步明确外国人在华宗教活动等问题的具体管理办法，为抵御宗教渗透工作的开展提供切实而充分的依据。

综上所述，党和政府在抵御宗教渗透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对什么是宗教渗透、宗教渗透的原因和危害以及如何抵御宗教渗透问题的理论原则和实践经验，这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新时期党和政府面临的境外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宗教渗透的问题，为抵御宗教渗透提供理论上的指导。

（责任编辑 唐晓峰）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1991年2月5日），《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216页。

[2] 《国务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1994年1月31日），《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274页。

[3] 《国务院关于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1994年1月31日），《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275页。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426号 宗教事务条例》，《中国宗教》，2004年第12期。